

熊培云
熊景明
肖唐鏢
唐建光
鼎力推荐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
『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董时进自传体小说

两户人家

董时进
著

学林出版社

两户
人家

董时进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户人家 / 董时进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486 - 0345 - 0

I. ①两…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8134 号

本书简体中文版版权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独家拥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 - 2012 - 304 号



两户人家

作 者——董时进

责任编辑——匡志强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0.5

字 数——27 万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345 - 0/I · 65

定 价——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一

董保中

《两户人家》是先父董时进的一部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自传性小说。家父对于家乡重庆垫江县有极大的热爱，改革开放后，在他 1984 年去世前，曾经两次回家乡。我 1999 年第一次到我父亲的出生地母安桥（现改为武安桥，我以为实在不妥），惊讶地看见他出生的乡野里的小房子是如此的破旧狭小，使我初次对我父亲小时候家境的贫穷有了直观的了解，我父亲还跟我们谈到过他父亲（我祖父）跟祖父的哥哥如何努力劳动，成家立业；而那些曾压榨欺负他寡妇祖母、夺取他家田产的亲戚们，却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后来都穷困不堪。

《两户人家》虽然是自传性的小说，只是重点在于作者幼年、青年时代，这自然是由于先父对于垫江老家的热爱怀念。它有着如此密切的“自传性”，使我或是熟悉我家的亲友们几乎可以对号入座地了解我父亲幼年时候的情形。但是，先父写作《两户人家》，更着重于家乡的另一个（或许更有意义的）目的，是借用小说的形式，表达他对中国农村生活现实情况的一些了解与看法。换言之，《两户人家》可以作为小说欣赏，也更可以作为历史真实的参考。

先父对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将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以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视为和西方封建制度一样的关系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在《两户人家》里，他以自己家庭在垫江的三代（他的祖父、父亲、自己）——也

即是《两户人家》内的钜楷、章氏（第一代）；正纶与正绪（第二代）；可生、可法、可立、可志等（第三代）——的经历为线索，叙述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的生活实况。

《两户人家》叙述一个无助的寡妇，竭力抵制“亲人”的欺诈，保护田地家产，护养两个孤儿。两个孤儿成长后，“各尽所能”谋生，包括买卖烟土。看到这些，使我大惊——原来我祖父年轻时贩卖过烟土谋生（小时在幼稚园时，我就知道鸦片烟、麻将、军阀、日本鬼子是中国的“四大患”）。小说结尾说到可生、可法、可志等的下一代（即是我们这第四代），以及有关可生几十年不见在大陆的亲戚们解放后的一切，以集中粹要的手法结束。原因之一，我猜测是由于我们这一代全都脱离了农村。我所知道有联系的堂兄弟姊妹们都住在都市里，没有务农的。

说到小说内人物可生兄弟的名字，“可”正是我父亲那一辈的“辈名”，按着可、保、国、安、平的顺序排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祖父兄弟二人的儿子们（即是我父亲那一辈）都不用“可”，而改以“时”字为名。我们这一代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们又都回到传统，以“保”字为名。下一代“国”字辈，现在“安”字辈也出生了。记得在我们重庆井口的农场的“工人”中有几个姓“董”名“可”什么的，他们都称我父亲为“大哥”，后来知道是我父亲的堂兄弟们，也有姓熊的，是我祖母家的。2006年我回到垫江母安桥，还遇到几位“可”字辈的长辈。

《两户人家》1981年在台湾出版。由于背景相距甚远，以远在清末时代开始的、在遥远的巴蜀的一个无名小县发生的情节，难以引起台湾读者们的共鸣与切身感。三年前（2009年），我意外得到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女士的“电函”（email），谈及国内由于“三农问题”对先父关于农村、农业的见解发生兴趣，并且谈到《两户人家》

在大陆出版的可能性，令我第一次感到我父亲不再孤独寂寞了。稍后，我又跟活力充沛、见解独到的年青的南开大学熊培云教授取得联系，并且读到他的新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惊叹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入了解，令我尤其感动的是培云对我父亲的农村、土地等问题见解的认同，使我这个不孝之子惭愧。

最后，可是最重要的 (last, but not the least) 是《两户人家》简体字版的出版。熊景明女士为这部小说出版事多方努力，几经辗转，终于将书稿交到认同该书价值的编辑手中，令《两户人家》得以和内地读者见面。她还在百忙中写了长篇序言，以帮助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小说所牵涉到的问题以及作者（我父亲）的某些见解。南开大学熊培云教授、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看历史》杂志主编唐建光先生等数位对家父及中国农村有研究有见地的学者专家做了热情的推荐。学林出版社副总编辑匡志强先生对书稿做了认真的编辑。在此，我要替代家父在天之灵对这些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2012年4月

于美国加州沙加緬度市

序二

熊景明

董时进 1900 年出生于重庆垫江，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班留学美国，1924 年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不同于跳龙门的学子，少年董时进离开故乡出外求学时，便立定改良中国农业的志向。他曾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

董时进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后来干脆辞掉公职，回乡办农业。董先生 1938 年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组织农业协进会，推广农业技术，从农民的角度评论时事。月刊和协会一直坚持到 1949 年。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留学归来者纷纷卷入政治。西方求学的生涯，令董时进树立了颇为坚定的民主理念。1945 年 10 月，董时进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但他因为不认同民盟“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纲领而退出。董时进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1947 年 5 月 12 日，董时进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民党。成立宣言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

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乡村与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一方面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迂腐”的观点不关政治，只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建言：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势必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也会导致土地细化，难以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绝不等同少数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的罪人。勤劳致富的土地拥有者，应当受到尊重。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富裕农民不应当被羞辱，被残酷斗争。中国历代优秀人才，大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地主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失去这一目标，农民缺乏动力。

上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而致力于社会改革或革命的知识

分子中，几乎没有人像董时进一样生长在农村，到西方研习农业经济，再回国事农，兼备理论和实践，对农村有深入了解的人。读《两户人家》，令我们理解他对中国农业和农村政策的远见从何而来。

他在开篇表明，“这本故事上的人名和地名，一概是虚构或借用”。故事发生在重庆垫江县，那是董先生的故乡。笔者再三向董先生后人求证，本书所有人物，无一杜撰，记载之年份以及情节，都基于真实。主人翁三个弟弟及子女的经历，均有据可查。董先生是书中的“可生”，他的经历与董时进完全吻合；“可法”乃弟弟董时光。有理由相信，本书为董先生的家族史，亦是他的自传。

这“两户人家”，即董的父辈两弟兄家的兴衰史，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代表了勤劳致富的朴素真理，告诉我们一个不能以阶级论是非的农村。

叙事始于19世纪中叶，作者的祖母，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章氏，克勤克俭，善于经营，置田买地，渐自将日子过出来了。书中描绘的细节，将概念演绎为历史的真实。“细娃望过年，大人望买田”，那时还是细娃的董时进的父亲，睁大眼睛看着母亲买田的“仪式”，“当契约写好，念过，大家签押之后，照例说句，恭喜你们子子孙孙永远管业。三个孩子都感动得眼泪长流”。

庄稼人的梦想不限于土地，尤其年轻人，志向在读书。董的父亲进了当地秀才设的私馆念书。在亲人眼中，他“由一个乡童逐渐蜕变成一个儒生模样”。正当他踌躇满志时，年过四十的母亲将他召回料理家务和田土。未曾多读书，他终身引以为恨，寄望下一代补救。书开篇的伏笔，延伸到他后来为儿子求学，在村里策划奔走，促成私塾，到不惜代价送儿子进省城，后远赴上海求学，再到倾家产送儿子留学美国，感人地刻画出一个农民对教育的追求，推进这个民族走向现代。

乡村人际关系的描写，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富农和佃农的关系，

常常出乎我们的想象。儿子满周岁，抓周抓到笔杆，让主人大为高兴，他跑出门，看见在翻晒谷子的长工，大声喊道：“老陈，我的儿子将来要做官，那时候你不必在大太阳下晒谷子，也无须在寒冬天气犁水田。你可以在衙门里面做一个跟班。”老陈不买他的账，他“懒洋洋地答道，‘等他做了官的时候，我早已经埋了烂了。’”又告诫他的东家“不要把锅盖太揭开早了，当心敞了气”。忠心、智慧的老陈，饥荒将到未到时，见女主人在米饭中掺红苕。他“面有不悻之色，道，‘老板娘，你的谷子不是可以吃到下年收割时候吗？何必这般节省呢？’”书中写到一位佃农对外出挑烟土挣钱，“地主”好生寂寞，终于盼到他归来。“邱大汉滔滔不绝，正绪听得津津有味。他们一边谈，一边吃，一边喝，直到半夜之后，没有一人显得疲倦”。

该书展现了跨越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在勤劳致富、农而商的主线索外，对天灾人祸、土匪来袭、赌博败家、民国革命等的记载，均都从农民的切身体验来描绘，令人耳目一新。对各种民俗，例如分家、击鼓伸冤等的生动记录，仿佛将读者带入时光隧道。百年前，西南乡村里，孝道既是给人看，也是儿女的真性情。正绪丧母后，在墓边搭了一个篾棚，守墓七七四十九天。道场做完，两弟兄要在阳世为母亲留纪念，扬声名，立节孝碑。“这桩事情，必须向县衙门申请，转成都总督衙门，向北京请皇帝圣旨，方能举办，需要时间至少数年”，事情数年后终于办妥，书中详尽的描写，为中国民间文化留下重要的注释。例如垫江初通邮政，“写信的人很少，邮件运输一概是人挑步行，两个轻细的包裹担在肩上跑步走，行人遇到都得让路”。全书都是普通农人的故事，也触及官场的污糟无能、官匪勾结等。

回忆录的成败，作者对细节的记忆至关重要。《两户人家》对西南农村各种节庆、婚嫁丧葬仪式的记载，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书中记载了许多民间歌谣，例如送财神，“一进财门大打开，四福天官送财

来。一送千年宝，二送万年财，三送三吉利，四送四发财，五送五子登科早，六送状元题金榜，七送天上七姐妹，八送神仙过海来，九送状元打红伞，十送状元转回来，十一送摇钱树，十二送聚宝坪。日落金，夜落银，初一起来捡四两，初二起来捡半斤，初三初四不去捡，秤称银子斗量金。滚进不滚出，滚一大堂屋”。作书时董先生已年过七十，去国数十载，想必对童年往事一念再念，才会记得如此清楚。有两章对村民自办私塾描写，温馨有趣，好笑之极。

董时进笔触谦和，在书中隐姓埋名，读者不难猜到是谁在为董家做传。他自出世便充满灵性，儿时就表现出对人情世故的感悟，对生灵万物的崇敬。作者青少年时代最密切的朋友，是替他家一生劳作的一头牛。对此，他另外一本小书《阿宝护牛记》，有更为详尽的描写。他在大学时代就对学习美国先进农业、农业机械有所保留，其精辟见解，今天读来字字珠玑：“中国农业乃是中国环境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和经济解构的一部分，是历代经验演变出来的成绩。要使农业方法和农业用具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市场、运输、工商业，以及土地与人口的比率等，都有改变，才能办到。”他后来反对实施土改，以至于对其它政党的农村政策失望，自创中国农民党，都基于他对农村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见解。

作者在描写旧的风俗习惯时，并无站在道德至高点的鞭笞、批判态度。他记述了以生命来反叛包办婚姻的年轻人惨烈的故事，也写出他自己在内的同辈“为父母娶媳妇”乐天安命的心理。作者带着深深的敬意、由衷的佩服，描写了多位农村妇女，尤其是祖母章氏、母亲熊氏。本书所有人都用化名，只有作者的母亲保留了真姓氏。

董先生的文字简洁、传神，“节令甫入仲秋，包家寨已呈冬意。寨墙上立着三个小娃，他们消瘦的身体，被棉袄衬成肥胖，他们苍白的面庞，被寒风染成紫红”，“饿死的人好似一阵烈风袭来，树叶纷纷坠

地，路边，街上，庙门口，到处是死尸”。书中佳句处处，风格独特，不落窠臼。

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被看成是对中国乡土文化精髓的最佳阐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对20世纪初农村社会的描述，被中外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视为经典，一再引用。

《两户人家》，无论对同时期中国农民的生计、社会关系、民风民俗、官民冲突和地方管治，社会动乱，农民的生老病死，婚姻和妇女地位等等，都有详尽的、从农民自身视角的描绘，堪与迄今看到的名著比美，是了解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的中国农村必读之书。20世纪80年代初在台湾出版后，曾获甚高评价。三十年后，这部书终于被学林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见到，得以在大陆出版。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以及《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还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离开大陆，辗转香港、台湾，后赴美定居，常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挂职研究，1984年在美辞世。他留下遗嘱，将政府发还的农场及房产作价款全数捐给西南农业大学，设立“董氏奖”，鼓励年轻人从事农业科学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恪守理性常识的人才。可惜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是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这本故事上的人名和地名，一概是虚构或借用，如有与真名雷同或近似者，乃属偶合，幸勿牵强附会。

著者

节令甫入仲秋，包家寨已呈冬意。寨墙上立着三个小娃，他们消瘦的身体，被棉袄衬成肥胖，他们苍白的面庞，被寒风染成紫红。他们不断地伸头出垛口瞭望，已经有一顿饭之久。小的两个男娃开始哼哼叽叽，“大姐，肚皮饿了，为啥公还没有送饭来？”

“昨天的饭还剩下一点儿，你们饿得那么厉害，为啥不回棚子里去吃？”大姊的声音有些不耐烦。

正纶和正绪都不肯走开。他们看见大姊的脸色，也不敢再嘀咕了。又过了半顿饭之久，正绪忽然大叫出来，“啊，老陈！老陈来了！”

大姊伸头出垛口，说道，“可不是老陈吗。他背了一个背篋，里面装的不是饭是啥子。”

“老陈，老陈。”正纶和正绪齐声高呼，“为啥公没有来，你来了？”

老陈没有答应，连头也没有抬起。

麻子老陈是黄家雇请的长工，大高个子，体力过人，能挑二百斤重的担子，犁田插秧，更是能手。而且为人忠实，脾气善良，尽管长得满面麻点，小娃们仍十分喜爱。姊弟三个急忙跑下寨墙，跑出寨门迎接老陈，又连忙追问，“为啥你来了，公没有来？”

老陈仍不理睬，而且脸上充满怒气。他跨进寨门，只管大步前走。小娃们只好跟在后头，自言自语，“为啥公没有来？”

老陈走进棚子，将背篋放下，对黄章氏忿怒样说道，“啊！那头该死的牛！恨不得立刻把它送进屠宰房。”

“你说的什么，老陈？”章氏诧异道，“娃儿们问你，为啥老人家没有来，你来了。”

“啊，少老板娘，你不晓得。昨天下午老人家被那该死的牛触了一角，受了伤，不能起床，所以我送饭来了。”

“啊！”章氏一声叫出，她的脸色突然改变，“触到哪里？伤势怎样？”

老陈跺脚答道，“伤势不轻呀。他正在驾牛碾米，孰知那该死的畜牲好似发了疯，劈胸膛给他一角，打倒在地下，爬不起来。我才叫佃客邱兴发上来，把他抬回屋去，躺在床上。我说恨不得两棍把那畜牲打死。他老人家还说，牛没有错，是他自己不好。老人家也真不听劝，大家都叫他不必自己动手，他总是不听，闲不住。”

老陈说话时，满脸通红，麻点闪烁跳蹦，好似狂风吹来，水田荡漾时的浮萍。

章氏沉默半晌，将背篋里的饭菜取出，摆在小桌上，说道，“老陈，你赶快回去告诉老人家，叫他务必好好休息，不要起床。我一会儿就回来。”

包家寨只是黄章氏和几个儿女的暂时避难之处。由于白莲教之乱，盗贼蜂起，到处抢劫杀人，黄运隆将寡媳章氏及三个孙儿孙女，送上包家寨躲避。那寨子乃是一个高山顶上石墙围着的堡垒，运隆在寨内赁了一小块地皮，搬了一些竹竿木棍和篾席上去，自行搭盖了一间小棚，略避风雨。棚子里未安炉灶，每天上午他在家煮点米饭和小菜，盛在背篋里面，自己送上山去。由家里去包家寨，约有十里陡坡路程，老人疾步爬上山去，抵达时饭菜还是温热。每天快到中午时刻，三个孙儿孙女定要爬到寨墙上头，立在垛口跟前等候。他们可以老远看见老

人家背着稀篮背篋，一耸耸地往石梯上爬。到了走近之时，他们便齐声大喊，“公公。”老人家就会抬起头来，向他们招手。孩子们就跑下寨墙，跑出寨门，立在平台上等候。老人鼓其余勇，飞奔上来。正绪便一把抱住他的腿杆，老人家就把他抱起来，一直抱进棚子里。

老陈去后，章氏照料孩子们吃过饭，自己也勉强咽下一碗，吩咐大姊道，“我要回家看公，你好好照护两个弟弟，不要跑出寨门，天黑以后，务必呆在棚子里面。小心灯火，万万不可大意。明天到时候，老陈自然会送饭来。公的伤势如不危险，我就回来。”

话说完，她拿起一根竹拐杖，走出棚子，向寨门去了。她以一双缠过的小脚，行走山路，沿途须停歇多次，到家之时，已近黄昏。她先到运隆的卧房，黑黝黝的，也听不见任何响声。她去灶房取了一根纸捻，从柴灶里掏出一撮火烬，点燃纸捻，点好了桐油灯盏。然后回到运隆的房间，轻步走到床前，低声叫道，“公，您怎么样啦？”

运隆徐睁睡眼，“哎”了一声，没有答话。

章氏再问道，“不要紧么？”实则她看见运隆的脸色苍白，已经吓了一跳。

运隆微微摇头，白胡须上拂拭了一下，答道，“啊，我该当死，魔鬼已经找着我了，不怪牛。”他停住了，双眼直对帐顶，忽然眼泪夺眶而出，呜咽地说道，“我乃是一个罪人，曾经对我的亲生骨肉下过毒手。你不知道，那是你的丈夫出生以前的事情。”他闭着眼，歇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晓得么？在钜楷出生以前，他的娘接连生下了五个女娃。女生向外，不能承继香火，只是加重负担，我无法养活那么多女儿。在第三个出生之后，我打定主意，如其第四个仍是女儿，只能忍痛下毒手。第四个果然是女儿。下地之后，我立刻把她投进水桶溺毙了。”运隆闭眼皱眉，好似抽筋，摇了两下头，又睁开眼说道，“事后我两三天吃不下饭，不料第五个又是姑娘，一不做二不休，又下了一

次毒手。”

章氏答道，“我知道，曾经听说过，晓得你有苦衷。”

“唉！”运隆伸手揩揩眼泪，接着说道，“若是两个姑娘出生在钜楷之后，我也不致干出那种事情。那时候我的家境不如现时的宽裕，怕的是养不活，大家受罪。没想到满四十以后竟生了钜楷。我以为香火有人接替了，老来有倚靠了。谁知到了六十六岁，反而要埋葬我的独子啊！”

运隆号啕大哭起来，章氏也禁不住哭泣了。她越哭越伤心，哭老人家老来殇儿子，哭自己年青死丈夫。翁媳相对哭泣了一杆烟之久，章氏安慰运隆道，“您有两个孙儿，不怕香火中断，务必安心休养。”

“这正是我放心不下的啊，”运隆道。“两个孙儿那么小，又逢着乱世道，好难扶养成人啊。幸而你是一位能干的女子，我知道。”他稍停顿一下，然后放低语声，接下去道，“你晓得么？我所最担心的，还不是白莲教，乃是底脚垮的一大家人。你懂我的意思么？我的亲侄儿，我的弟弟的儿子，文楷，和他的一大群儿子。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我与我的弟弟运盛，原是平分家产，他们逐渐败下去了，运盛不勤俭，又好惹事情。文楷就像他的老子……”

“我晓得，”章氏插嘴道。“大家叫运盛叔做凿锅漏，叫您做补锅匠。他惹出事情之后，总是您去道歉和赔偿。”

运隆的脸上微露笑容，说道，“你怎么晓得这些啊？过去的事情，不必管它。但是，我不能不为你们几母子忧虑。文楷一家人，早已把我们的一份家产看作俎上之肉。起先以为我没有儿子，钜楷出生后，他们大为失望。不料钜楷正当成年后忽然死了。这又使他们暗地欢喜，又以为我们的一份家产终究是他们的。”

章氏心肺上涌，却咬紧牙根，压下情绪，说道，“请老人家不必朝坏的方面着想。文楷大伯应该知道您老人家对他一家是如何厚道，不